

中国引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三重路径

陈志敏

习近平主席在 202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中提出“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靠”“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系统回答了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同各方一道共同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公平、有序发展，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人工智能治理理念的感召力、治理制度的有效性和治理行动的赋能力，汇聚全球共治合力，有力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包容普惠发展，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作出更大贡献。

理念引领：把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正确方向

“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习近平主席这一重要论述为世界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跨越利益分歧、凝聚最大共识提供价值引领。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理念以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为目标，以保障社会安全、尊重人类权益为前提，把人的主体地位、各国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保障、文明多样共存置于同一治理框架，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把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作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根本目标。技术进步能够延伸人的能力、拓展发展空间，但技术能力的增长不会自动转化为普遍福祉。人工智能如何研发、部署和使用，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类作出怎样的价值选择和制度安排。习近平主席强调：“人工智能应当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这就要求尊重人的主体地位，把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安全贯穿研发应用全过程，不能让算法逻辑取代人的价值判断，更不能让技术成为操纵社会、侵害权益的工具。中国倡导向上向善，是为创新划定正确方向，使技术进步同人的全面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相统一。

坚持开放共赢、创新发展，把共同繁荣置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议程的重要位置。人工智能蕴含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方面迫切的发展诉求和能力短板需得到更加充分的关注和回应。习近平主席强调：“鼓

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中国把发展权、使用权和受益权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议程，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议程在重视风险防范的同时，充分关注和回应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共享发展机遇的问题，为全球南方国家平等进入智能时代提供了重要价值支撑。

坚持公平普惠、包容并蓄，把平等参与和文明多样性作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正当性的重要来源。各国不论大小强弱，都有平等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的权利，也应当平等参与议程设置、规则制定和治理决策。人工智能处理的不只是数据，还承载着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伦理和社会经验。习近平主席指出：“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不应该侵蚀和损害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文化独特性。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中国主张尊重各国国情、发展阶段和治理选择，既推动弥合基础设施、技术资源和人才能力差距，也重视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不公。这种兼顾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文明多样性的价值立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引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的具体体现。

制度引领：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由分散探索走向协同共治

习近平主席强调：“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人工智能影响跨越国界、风险相互传导，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独自应对。同时，人工智能带来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需要各国合作共享。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建立起人工智能领域的一系列治理机制，但仍存在治理机制碎片化和治理能力严重不足的突出问题。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一系列举措，积极推动联合国体系内的人工智能治理机制建设，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以常态化合作机制凝聚治理共识，推动形成联合国发挥重要作用、全球和区域机制相互补充、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维护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支持联合国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有利于保障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议程设置和规则讨论，有利于维护国际规则的普遍

适用。自《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并积极参与。建设多边合作平台，正是为了把对话共识转化为长期机制，把共同愿景转化为务实成果。

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搭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制度平台。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作为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向善普惠原则，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向所有国家开放。其重要意义在于把阶段性会议和政策对话转化为常态化制度合作，把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能力建设和联合研究纳入相对稳定的合作框架，为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持续参与治理、对接资源、开展项目提供新的制度平台。同时，建设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也将对联合国框架下的现有国际机制形成有益补充，提供有力支持。

推动发展战略、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对接协调，增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整体效能。《202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提出：“建立具有广泛共识、科学、透明、包容的标准规范框架，促进各国间标准互认，降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成本和门槛。”当前，各国人工智能治理仍处于快速探索阶段，制度规范、监管路径和技术标准存在差异，需要针对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区情国情强化对接的精准性。中国大力推进面向不同区域和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机制建设，2024 年以来相继成立了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中国—上合组织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和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面向东盟、非盟、拉共体的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也已纳入规划。

行动引领：把中国主张转化为务实治理成果

习近平主席指出：“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理念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治理的有效性在于行动。中国以自身创新发展和治理实践不断丰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经验，又围绕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现实需求提供技术、人才、平台和应用方案，推动中国主张由原则倡议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持续的合作成果。

强化创新发展和开放生态，拓展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机遇。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突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促进模型算法、智能芯片、云平台和场景应用贯通发展；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完善数据供给、流通、利用和安全治理机制；发展开源开放生态，降低中小企业和广大用户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推进绿色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人工智能在能源调度、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中的赋能作用；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持续创新夯实人才基础。中国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源源不断提供新的开源技术、市场空间和合作机遇。

统筹发展和安全，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探寻平衡路径。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统筹人工智能发展和安全，强调：“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同时，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中国围绕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持续健全风险评估、算法备案、内容标识、技术监测和应急响应等制度，探索形成分类分级、全生命周期、敏捷治理等实践，为国际社会识别风险、明确责任、完善标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工具。

推进能力建设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平等受益。中国呼应全球南方国家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需求，在联合国相继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人才培养、应用场景和治理能力形成系统合作框架；发起成立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之友小组，汇聚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多方资源；积极参与联合国支持下的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发展网络建设，促进各国需求与技术、知识、人才和项目资源持续对接，常态化开展国际交流培训，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 30 个国家落地应用，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弥补短板。由议题倡导到方案设计，再到合作网络 and 具体项目，中国正在推动能力建设由原则倡议走向实践举措，以实际行动助力弥合智能鸿沟，彰显大国责任担当。

（据《人民日报》）

在智能影像艺术学院实验实训中心，一套定焦镜头组归还时,管理员常规目视检查未发现异常,设备被重新上架。3周后,另一剧组使用时发现对焦环在特定焦段出现明显阻尼不均,设备检测确认:内部对焦导轨因长期微小形变累积,已超出设计容差,维修报价为镜头原值的18%,核心矛盾随之浮现:谁该为此损耗负责?

智能影像艺术学院实验实训中心采用“最后使用者负责制”,具体来说,即最后归还设备的人需对设备状态承担相应责任。该套制度对于当场可见的损坏(比如摔碎的滤镜)具有效力,但是对于累积性隐形损耗存在结构性缺陷:当设备处于“尚可使用但已不好用”的状态并持续流通时,每一位使用者都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任何单个使用者无须担负全部责任,最终演变为典型的“公地悲剧”:人人都倾向于多借一日,少加爱护一分,由于损耗的代价最终由集体承担,而额外爱护的收益却为下一位使用者获取。依据本文作者所在学院 2023—2024 学年的设备维修记录,在所有非计划维修事件中,占比 37.6%的被归类为“原因不明”或“累积性故障”,其中镜头组和无线音频设备中该比例分别达到 41.2%与 44.7%;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原因不明”维修的平均单次成本(1247 元)明显高于损坏事件的平均单次成本(689 元)。该数据凸显出一个长期未被关注的管理方面的黑洞:最为昂贵且最为频繁发生的损耗情形,正是那类无法有效进行归责判定的类型。

Hardin 在 1968 年揭示了共享资源缺乏有效治理将走向退化的公地悲剧逻辑,Ostrom 在 1990 年进一步提出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八项核心设计原则,但这类经典理论在艺术院校设备管理领域的应用研究仍十分有限。

现有相关研究多聚焦贵重设备共享与成本分摊、预约系统数字化优化、实验室安全制度建设三类主题,重点关注“明显损坏”“安全事故”的责任追究,对隐蔽性更强、治理难度更大的“累积性隐形损耗”缺乏专门探讨。且公地悲剧传统解决方案——私有化或强制管制,在智能影像艺术学院场景下完全不适用:设备需满足教学共享要求,强制管制也与艺术院校倡导的创作自由文化、影视创作的探索属性天然冲突,由此衍生出核心研究问题:能否在不私有化、不强制管制的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缓解这类隐形损耗型公地悲剧。

当前研究存在三重明显缺口:既未聚焦累积性隐形损耗,也极少关注学生剧组这类特殊使用场景;公地悲剧理论应用未涉及归因链条断裂的隐形损耗议题;现有实验室管理激励机制以惩罚逻辑为主导,正向激励有效性尚未得到验证。最新公地治理研究证实非正式组织治理具备可观实践成效,自我决定理论、行为塑造理论也共同支撑了正向信息型激励对内在动机的激发作用,为该问题的破解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

基于上述理论视角,本研究提出核心判断:对于智能影像艺术学院这一高度珍视创作自主性的群体,针对“累积性隐形损耗”的制度设计应以“正向激励”为主轴,以“过程可追溯”为支撑。本研究在智能影像艺术学院实验实训中心开展了一项为期一学期的准实验研究,核心研究问题如下: RQ1:引入“多节点检查+小组信用分”干预后,设备维修频次和设备可用时长是否显著改善? RQ2:正向信用激励是否能有效引导学生的保护性使用行为? RQ3:学生对“过程可追溯”管理的接受度如何?是否存在对“监控感”或“创作自由受限”的担忧?

本研究旨在填补现存研究的空缺,于理论层面进行定位:将公地悲剧理论的应用范畴从“可见的资源退化”拓展至“隐形的累积损耗”,并且引入自我决定理论以及正向强化原则,以检验“过程可追溯性和正向信用激励”的组合在智能影像艺术学院设备管理中的实际效果。

一、研究发现

本研究在实验开展前,对控制组与实验组的基线特征进行均衡性检验,两组在设备配置与使用者相关指标上均无显著差异(P>0.05)。最终有效样本覆盖控制组 2 组镜头、4 套无线设备、实验组 3 组镜头、4 套无线设备,组间基线具备可比性。

干预效果数据显示,设备运维维度优化成效显著:实验组总维修 7 次,标准化后平均每套维修 1.00 次,较控制组的 2.00 次/套下降 50.0%(Mann-Whitney U 检验,P=0.031,Cohen's d=0.87),其中镜头组维修频次降幅达 66.7%,无线系统降幅 37.5%。设备可用时长方面,实验组每套平均维修停用 4.3 天,较控制组的 9.5 天提升 54.7%(t=2.87,P=0.017),时间序列分析显示第 8 周后实验组累积维修曲线趋缓,呈现明显的干预延迟效应。

责任纠纷与信用关联分析层面,实验组投诉量仅 3 次,较控制组的 9 次下降 66.7%(卡方检验 X²=4.50,P=0.034),其中 2 次投诉通过签名卡完成精准追溯,验证了可追溯机制对无辜使用者的保护作用。学期末小组信用分与设备状况评分呈显著正相关(皮尔逊 r=0.73,P=0.007),控制协变量后相关性仍稳定显著(偏相关 r=0.68,P=0.012)。

焦点小组访谈(16 名学生参与)结果显示,14 名学生认为签名卡与日志操作简便,仅高年级学生反映大规模剧组中设备轮值员负荷偏高;半数学生存在“被监控”顾虑,6 名学生认为可追溯机制实际保障了创作自由;15 名学生将“额外设备时长”“优先预约权”评为极有用,电子徽章激励吸引力偏弱;15 名学生表示干预提升了设备爱护意识,9 名学生承认存在掩盖损耗的可能性,但签名卡设计有效压缩了该空间。

损耗归因编码(两名编码者 Kappa=0.86)结果显示,实验组可预防损耗占比 28.6%,较控制组的 75.0%下降 61.9 个百分点,实验组减少的维修均为可预防损耗,且不可预防损耗绝对次数达 4 次,高于控制组的 2 次,证实干预成功将人为滥用类损耗转化为正常磨损,契合设备可持续管理的核心目标。

二、研究结论

从研究中总结三条供艺术院校借鉴的设计原则:一,检查节点遵循最小化可行原则,节点时长限两分钟,关键项目不超过八个。二,信用分以正向为主,加机会远超扣分风险。三,奖励采用即时与延迟结合,延迟收益对长期行为作用显著,即时认可可激励少数成就导向学生。总体而言,当制度助创作而非约束,损耗可追溯时,学生会成为集体资产的守望者。

(作者王子凡系白俄罗斯国际管理与创业学院硕士在读,四川传媒学院智能影像艺术学院助理实验师;付斌系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6 级博士在读;张立鹏系泰国格乐大学硕士在读,四川传媒学院、四川传媒学院纽约电影学院助理实验师;张晓系四川传媒学院智能影像艺术学院助理实验师)

从『隐形损耗』到『可追溯责任』

王子凡 付斌 张立鹏 张晓

智能影像艺术学院学生剧组设备管理的流程再造与正向激励研究

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赋能民生改善的价值与实践路径

王雪 陈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揭示了旅游业的民生属性,对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为旅游业注入文化之魂、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赋能民生改善的核心价值

拓宽增收渠道。文旅产业关联性、包容性强,可关联民宿康养、研学体验、夜间经济、文创开发等多业态,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等多领域共同发展,还可包容农村富余劳动力、返乡青年等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就业创业,成为拉动内需、富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提升精神生活质量。文旅产业能够丰富面向群众的文化服务,有效增强文化认同、地域归属感与文化自信,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多元化的文旅体验能够在缓解生活压力的同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质。

倒逼城乡服务协调。文旅项目规模化建设,能够推动城乡交通、休闲配套、文体设施、智慧服务等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推动城市优质

公共服务、文旅资源向乡村下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实现生态绿色惠民。文旅高质量发展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基本前提,以保护与发展并代替代粗放式开发,有利于环境优化、生态保护和景观提升,以良好的人居环境将绿色生态转化为惠民增长点。

二、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赋能民生改善的作用机制

一是产业传导机制。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突破了传统旅游业产业链条短、附加值偏低、辐射带动弱等局限,注重产业升级、业态创新、品牌赋能,通过横向广泛联结上下游产业,纵向深挖产业发展潜能,带动多方主体增收获益。

二是资源转化机制。通过科学系统规划,盘活非遗、民俗资源及闲置民居、老旧街区、生态资源等闲置低效资源。如打造非遗和民俗体验项目,把闲置民居打造成民宿、文创工坊,把老旧街区改造提升为文商旅体展等融合业态空间,创新多元消费场景。

三是公共溢出机制。为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必须持续完善交

通、休闲娱乐、生态景观等公共配套设施与服务。这些设施和服务对于满足本地居民出行、娱乐、文化消费等日常需求,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出主客共享的溢出效应。

四是价值认同机制。文旅融合发展以文化为灵魂和内核,通过将历史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参与的文旅产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持续的文化浸润有效增强文化自豪感与归属感,缓解现代社会原子化带来的疏离感,构建稳定精神寄托和强大文化认同。

三、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赋能民生改善的实践路径

深化业态创新,夯实惠民产业根基。全面梳理本土资源,摸清文化家底,打造差异化、沉浸式高品质文旅业态,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深化“文旅+”,横向拓展文旅体商等多领域跨界融合,纵向深挖文旅潜力,开发康养、研学、夜间经济等多种业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坚持普惠导向,均衡城乡文旅民生红利。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培育乡土文创、田园休闲、民俗体验

等特色业态,建立本地居民优先就业、优先受益机制,通过村民分红、务工增收、自主经营等方式保障群众权益。推动城市优质资源和服务向乡村下沉,实现文旅成果全域普惠。

践行主客共享理念,完善民生配套体系。统筹推进城乡交通、绿化、休闲广场、文化场馆等基础设施升级。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日常需求,将文旅配套转化为普惠性民生设施,既保障文旅产业发展,又持续提升人居环境、丰富群众生活,全面提升居民幸福感。

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构建长效惠民体系。建立文化和旅游、农业农村、民政等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统筹推进文旅开发与民生保障协同发展。重构文旅评价体系,将居民增收、公共服务升级、群众满意度等民生指标纳入核心考核。

【作者单位:中共曲阜市委党校;本文系 2025 年山东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课题“文旅融合发展的民生效应提升策略研究——以济宁市为例”(立项编号:2025XTN09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